

教育部人文科学基金项目

PAIXIYUWAIJIAO

MINGUOSHIQI

DUIRI

WAIJIAOSIXIANGYANJIU

# 派系与外交

—民国时期对日外交思想研究

主编 赵英兰



吉林大学出版社

教育部人文科学基金项目

派系与外交  
——民国时期对日外交思想研究

主编 赵英兰

副主编 郑云波 管书合

李秀原 吴蓓

吉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派系与外交：民国时期对日外交思想研究 / 赵英兰主编. —长春：  
吉林大学出版社，2005.3  
ISBN 7—5601—3259—6

I . 派… II . 赵… III . 中国—对外政策—研究—日本—民国  
IV . D822.3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60834 号

**派系与外交**  
**主 编 赵英兰**

---

责任编辑、责任校对：李国宏

封面设计：孙 群

---

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明德路 421 号)

吉林大学出版社发行  
吉林农业大学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3.75  
字数：333 千字

2005 年 3 月第 1 版  
200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 000 册

---

ISBN7—5601—3259—6 /

定价：27.00 元

## 前 言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两国人民有着 2000 多年的交往关系。东汉光武帝时期，倭国使臣奉贡朝贺，光武帝赐金制印绶，上刻“汉委奴国王”五字，从此在历史上有了中日两国外交的记录。在隋唐时期，中国社会文明高度发展，深为日本所仰慕，因此日本多次派遣唐使和留学生到中国，学习中国先进的政治制度和文化，这对日本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在此后的中日两国关系中，虽然有过元朝忽必烈对日本的几次远征和明朝倭寇渡海对中国边境骚扰，但是前者因为元军遭遇飓风，全军覆没；后者则有明朝抗倭名将戚继光率领中国军民驱逐倭寇，平定了倭患。这些活动都没有从根本上影响各自国家的政治局势和社会结构的变化。更何况在中国古代，中国的皇帝都往往以“天朝上国”自居，视日本为“弹丸岛国”、“蕞尔小国”，在处理两国外交的时候，也往往是炫耀国势和怀仁邦交为主，根本没有近代以条约形式确定双边关系的观念。外交只不过是王朝政治的附属物，对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没有什么重大的影响。

然而，到了近代，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中日两国虽然同受外敌入侵，但是，日本在外敌入侵面前，锐意改革，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明治维新后，仅两年多的时间就吞并了琉球，二十多年内就反逼欧美列强修改了全部的不平等条约。日益强大起来的日本，也走上了侵略扩张的道路，加入了侵略中国的行列。而此时的中国，长期封闭的国门被英国的坚船利炮打开后，其他的资本主

义列强也接踵而至，强迫中国与之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古老落后的中华民族被强行纳入国际轨道。此后中国“天朝上国”的迷梦被打破，外交上就开始与丧权失地的耻辱相联系。在中日关系中，随着日本羽翼丰满，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也与日俱增，侵略步伐日益加快，甲午战争一战而胜，夺走了台湾，并获得了巨额赔款，十年以后，日本打败了俄国，吞并了朝鲜，成为中国最大的威胁。

清朝灭亡后，中国历史进入了军阀混战的民国时期，各派军阀由过去统治阶级政治斗争的工具而转变为政治舞台的主角，活跃于历史舞台上。加之列强对军阀的有意培植和操纵，更加剧了中国军政派系林立、社会动荡不安的局面。军政派系为了能在政治斗争中立足，展开了折冲樽俎的斗争，希望依靠某一国家的力量取胜。在各列强中，日本从辛亥革命起，就一直在中国物色能服务于它的政治势力。各军政派系为了各自的利益对日本或排斥或联合，展开了纵横捭阖的斗争，所有这些都表明，在民国时期，外交不再是政治斗争的附属物，而是决定各方势力能否立足、取胜的力量，同时也是决定中国社会发展进程的力量。正因为此，外交在社会上所占的地位也日益重要起来。随着民国时期外交用人制度的改革，研究外交，通晓国际政治和近代外交知识的专门人才开始出现，并且形成了初步的规模。同时在社会上，在各派力量的斗争同时，越来越多的外交手段被应用于国内斗争。

正因为民国时期的外交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外交思想、外交策略对于某种势力、某个集团、甚至国家的生死存亡都起决定性作用。所以，建国以来对于民国政府的外交研究也越来越重视，出现了关于民国外交史的论著。然而，当我们为民国外交史研究成果高兴之余，却不免感觉有些遗憾。这就是在外交史的研究中，由于长期受“弱国无外交”这个简单结论的影响，史学界的研究焦点往往集中于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问题上，而忽视

了对民国时期活跃在历史舞台上的军政派系要人丰富多彩的外交思想的整体研究,对于当时军政要人如何使其思想更好地配合现实的斗争研究的力度也不够。因此,为了弥补这方面的不足,我们多年来一直关注民国时期主要军政派系的外交思想,并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今天我们就以民国时期派系与外交为切入点,对民国时期军政派别对日外交思想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以期更全面、更科学地反映民国时期外交的全貌。

综合我们的研究成果,呈现以下特点:

一、以对日外交思想为主线,对民国时期军政派系对日外交思想进行了系统研究。

我们之所以选择日本,出于这样的考虑:近代以来,日本是最后一个将侵略魔爪伸向中国的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尽管这样,日本并没有放慢其侵略步伐。早在明治初年,开始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日本就制定了向亚洲大陆扩张的“大陆政策”,将中国视为“大东亚共荣圈”的组成部分,不断地入侵中国。对晚清以来,列强在侵略中国过程中形成的共同支配和控制中国的“均势”发起挑战,他们利用其对华的地缘优势,不断动用武力。在整个近代,日本对华发动战争十余次,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巨大灾难。这在中国近代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英、法、德、俄等欧洲列强早已无暇东顾,美国随着时间的推移也日益把主要精力投入欧洲战场,这就使得日本在远东的实力空前膨胀,俨然成为这一地区的霸主。此后,在整个民国时期,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巩固和扩大其在华既得利益,不断地在中国物色能服务于它的政治势力。袁世凯、段祺瑞、张作霖等先后被其拉拢收买,成为日本在华的侵略工具。就这样,日本在其侵华的过程中,软硬兼施,或弃或用,引诱与威胁并用,拉拢和战争并存,动用了一切可以动用的外交手段来为其侵华策略服务。而活跃于民国历史舞台上的各

派势力,为了各自的利益也进行了相应的外交活动,他们对日本或依靠、或利用、或威胁、或投降,一时间,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华民族的生存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对日外交也就成了决定中国命运、主宰中国历史进程的重要因素,所以,以民国时期对日外交思想为切入点进行研究,可以使我们能更清楚地看清民国历史的真实面目,能更加真实地反映这一时期的历史,尤其是外交史的发展历程。

## 二、以民国时期军政派系主要代表人物为研究对象,以求更全面、真实地反映民国时期的历史面貌。

为了更全面反映民国时期各派系的对日外交思想,我们在研究中,选择了活跃在民国历史舞台上的主要派系,如资产阶级立宪派、革命派、北洋军阀、皖系军阀、奉系军阀、蒋系、胡系、戴氏、新政法系、冯系、桂系、东北军、第二十九军等各派政治力量,对其代表人物梁启超、孙中山、袁世凯、段祺瑞、张作霖、蒋介石、胡汉民、戴季陶、张群、黄郛、冯玉祥、李宗仁、张学良、宋哲元等的对日外交思想进行研究。在选择研究对象时,我们尽量不遗漏对整个民国时期有重要影响的派别,不但包括当时在中国执政的各方力量,而且对于执掌一方大权,对中国社会产生重要影响的地方派系和政治派别也进行了研究,力求能全面地反映出民国时期军政派系的对日外交思想,更真实地反映民国时期的历史进程。

## 三、注重发掘各派系代表人物对日外交思想的主张、特点及其外交思想在现实的外交斗争中所起的作用。

近代以来,由于中国人民深受帝国主义的剥削和压迫,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连年不断的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无尽的痛苦,再加上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的需要,在对日外交思想的研究中往往出现一种倾向,这就是只注重反日、排日、抗日倾向的思想研究,而对民国时期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以及国内各派的对日外交思想缺少客观、公正的评价。有鉴于此,我们在研究民国时期各派

系对日外交思想的过程中，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从对军政派系要人留下的材料入手，结合当时的国内、国际形势，对各派代表人物对日外交思想的主张进行深入地挖掘，纠正了以往研究中偏颇的观点，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在这些问题的研究上，我们有了一些新的突破。

首先，对于各军政派系对日外交思想中师日、联日以及反日、抗日的爱国思想，给予充分的肯定。

在研究中，我们不仅对资产阶级立宪派提出的师法日本、变法图强以便使中国走向自立自强道路，革命派联合日本以谋求日本对中国革命的支持和谋求中国最大利益等主张以及对其反日、抗日的活动予以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而且也为宋哲元“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奋斗牺牲，誓雪国耻”和“向日本打出前途”而喝彩，为李宗仁在国难当头“焦土抗战”的决心而感动，为张学良深明大义，倡导国共合作，共同抗日而振奋。

其次，对于一切投降卖国思想和行为，予以无情的抨击。

我们对袁世凯为了换取日本对其复辟帝制的支持，而与日本签订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的卖国行为予以抨击。对皖系与日本勾结，借助于日本力量排斥异己，制造国内混乱局面以及借助日本力量实现武力统一的行为进行抨击，指出这种联合无异于与虎谋皮，得不偿失。

再次，对于割据一方的地方军阀与日本勾结、周旋的外交策略进行了实事求是的评价。

民国时期是军阀割据的时期，复杂的中国局势，使割据一方的军阀势力，为了保住各自的利益以便在国内斗争中能够立足，在对日外交上也采取了相应的策略。桂系李宗仁为了割据广西，与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相抗衡，并曾经与日本多次联系，交往频繁，其目的就是为了实现“师夷长技以倒蒋”，但是随着中日民族矛盾

的上升,李宗仁还是把民族和国家的利益放在首位,毅然断绝了与日本的联系,走上了抗日的道路;奉系张作霖为了实现“君临东三省”的目标,也曾经依靠日本,但是当日本的控制限制了张作霖向关内发展的时候,二者的矛盾凸现出来,张作霖思想中的反日、排日的动机,最终为日本人所不容,惨死在日本人之手;宋哲元在对日本的态度上,也随着蒋介石对他的态度,出现过波动。对于这些地方实力派在对日外交思想上的变化,我们都依据历史事实,进行了客观公正的分析评价。

第四,对于蒋系集团对日外交思想,也进行了客观公允的分析。

对于蒋系以及服务于南京国民政府的派系,在研究中我们抛弃了对他们联日行为和倾向简单的一骂而不做客观公正的评价的做法,而是对他们所处的形势和不同历史阶段进行客观细致的分析。我们在批评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为了达到反共的目的,提出“攘外必先安内”,在向日本妥协、发动内战的同时,也看到了在抗战期间,蒋介石也没有完全放弃抗战,他也随着国际和国内局势的变化,在处理与日本的关系上,也是时而亲善,时而妥协退让;但是,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日益深入,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以后,蒋介石在对日外交中也采取了强硬态度,特别是卢沟桥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一面积极寻求国际援助,一面发表宣言,重申抗战到底的决心,并且与共产党结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成了中国国内全民抗战的高潮。尽管在抗日战争中,蒋介石在对日外交中有妥协软弱的因素,但是从全民族战争这方面看,蒋介石、国民党在抗战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应该得到客观、全面的理解。

四、注重发掘史料,做到史论结合,更加客观、真实地反映各派对日外交思想。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们注重从大陆、台湾和日本等出版的各派人物的文集、年谱、日记、回忆录、文献档案资料、报刊杂志资料和历史档案资料入手,进行分析总结,并且结合对当时社会背景的研究,做到有史有论,史论结合,力求系统、客观、准确地反映军政要人的真实面貌和这些思想对当时外交的影响。

系统地研究民国时期军政派系的对日外交思想的专著,国内目前尚无出现,所以,蹊径独辟,难免会有失偏颇和疏漏之处,再加上我们的学识和水平的限制,也难免会有遗憾;但是,我们愿抛砖引玉,希望以此引起学界同仁们对此问题的更多关注,我们也就无比欣慰了。

作者

2005 年 3 月

# 目 录

<b>第一章 立宪派梁启超对日外交思想演变</b>	1
一、师法日本 自立自强	1
二、联日拒俄 图保自存	10
三、“名誉孤立” 夹缝求生	21
四、反对侵略 “联日疏美”	33
五、捍卫权益 反日爱国	42
<b>第二章 革命派孙中山的对日外交观</b>	54
一、谋求革命、国家、世界利益	54
二、平等、和平、互助的“中日亲善”	63
三、对日本利用外交、军阀征服中国之策的批判	70
四、孙中山对日外交思想的特点	74
<b>第三章 北洋军阀鼻祖袁世凯的对日外交</b>	80
一、驻朝时代：以战止战 全面排日	81
二、封疆大吏时期：从以日为师到“联英美制日俄”	91
三、辛亥革命时期：一面抵制 一面妥协	96
<b>第四章 晚系段祺瑞“联日”与“媚日”</b>	114
一、争取日本协助 提高国际地位	114
二、依靠日本支持 实现南北统一	120
三、掬示合作诚意 取得日本信任	133
四、满足侵略要求 换取日本支持	140
五、利用列强矛盾 胁迫日本援助	144
六、段祺瑞联日、媚日外交之分析	151
<b>第五章 奉系张作霖“亲日”与“抵日”</b>	159

一、亲日：争取日援以图自固 .....	159
二、抵日、排日以求自主 .....	168
三、交涉中抵抗与妥协并用 .....	183
四、张作霖对日外交特点 .....	201
<b>第六章 敌乎？友乎？——蒋介石对日外交思想演变 .....</b>	<b>208</b>
一、大革命时期：“亲善”外交 .....	208
二、九一八前后：妥协外交 .....	214
三、华北事变：转向强硬 .....	225
四、抗战时期：抵抗中求“和平” .....	233
五、蒋介石对日外交思想的主客观因素 .....	245
<b>第七章 妥协“是走进没落的程途”</b>	
——胡汉民对南京政府对日外交的批判 .....	250
一、国联、列强不可恃 .....	250
二、降日是“南京政府外交的绝路” .....	255
三、用“赤铁与热血”进行武力抗战 .....	260
<b>第八章 五四前后戴季陶的对日外交观 .....</b>	<b>266</b>
一、对日本侵华政策的批判 .....	266
二、“联美制日”、“以暴易暴”、“殖产救国” .....	271
三、对孙中山、蒋介石的影响 .....	276
<b>第九章 中日折冲主角——新政学系对日外交策略 .....</b>	<b>282</b>
一、黄郛：忍小愤以就大谋 .....	282
二、张群：平等互惠互尊主权 .....	293
三、张川会谈：以完整华北主权为底线 .....	302
四、新政学系对日外交思想的特点 .....	309
<b>第十章 “对日决不妥协”</b>	
——抗战前冯玉祥对日外交主张 .....	321
一、日本是中国“惟一的最大的敌人” .....	321
二、抗日是“中国的惟一出路” .....	325
三、对日不抵抗是“民族的自杀政策” .....	330

---

四、依附国联就是“甘愿做帝国主义的奴隶” .....	332
<b>第十一章 “焦土抗战”——桂系李宗仁对日外交观 .....</b>	<b>336</b>
一、“师夷长技以倒蒋抗日” .....	336
二、“焦土抗战”是中华民族的惟一出路 .....	340
三、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全面抗战 .....	350
四、驱逐日本侵略者是抗战的最终选择 .....	356
<b>第十二章 东北军张学良对日外交观 .....</b>	<b>360</b>
一、“中日问题绝没有和平解决的希望” .....	360
二、东北交涉中的相对应策 .....	364
三、对日外交策略失误与影响 .....	370
<b>第十三章 华北问题交涉与宋哲元对日外交策略 .....</b>	<b>375</b>
一、“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 .....	375
二、附和日本 立足冀察 .....	384
三、表面亲善 圆滑应对 .....	400
四、维护主权 尽量避战 .....	411
五、宋哲元对日外交思想的基础 .....	420
<b>后记 .....</b>	<b>425</b>

# 第一章 立宪派梁启超对日外交思想演变

梁启超的一生与日本有着特殊的关系，中日关系问题也是他关注和不断思考的一个重要课题，对日外交思想的内涵十分丰富。

## 一、师法日本 自立自强

甲午战争，古老的中华帝国被弹丸岛国日本打败，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立宪派开始以一种全新的目光来重新审视明治维新后日本的成功：即效法日本明治维新，变法图存；借途日本，学习西方。

### 1. 师法日本，变法图强

梁启超认为，日本是一个蒸蒸日上的国家，是世界的后起之秀，东方先进国家，“夫日本古之弹丸，而今之雄国也。三十年间，以祸为福，以弱为强”。<sup>①</sup>“日本以区区三岛，县琉球，割台湾，胁高丽，逼上国，西方之雄者，若俄若英若法若德若美，咸

---

<sup>①</sup> 梁启超：《日本国志后序》，《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中华书局，1989年，第50页。

屏息重足，莫敢藐视。呜呼！真豪杰之国哉。”<sup>①</sup>他认为，日本之所以由弱转强，迅速地崛起就在于它成功地进行了变法与学西方。所以，梁启超认为，中国要想摆脱落后的面貌，就应该师法日本，希望中国学习日本，变法图强，并且数次以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而实现富国强兵、摆脱被奴役地位为例，论证变法是中国摆脱帝国主义奴役的一个法宝：“今夫日本幕府专政，诸藩力征，受俄、德、美大创，国几不国。自明治维新，改弦更张，不三十年，而夺我琉球，割我台湾。”<sup>②</sup>“日本败于三国，受迫通商，反以成维新之功。”<sup>③</sup>所以，他通过日本变法使国力由弱变强的事实，认识到：“夫今日在列（强）大竞争之中，图保自存之策，舍变法外，别无他途。”<sup>④</sup>在如何变法问题上，他认为：“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也，然求其时地不远，教俗略同，成效已彰，推移即是。若名书佳画，墨迹尚存，而易于临摹。如宫室衣裳，裁量恰符，而立可铺设，则莫如取鉴于日本之维新矣。”<sup>⑤</sup>他认为效法日本，实行变法，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取得成效。“吾今取之至近之日本，察其变法之条理先后，则吾之治效，可三年而成。”<sup>⑥</sup>

梁启超还把日本的明治维新和中国的洋务运动进行了比较，提出变法必须要变其根本。他指出，日本明治维新是从改革官制

① 梁启超：《记东侠》，《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中华书局，1989年，第29页。

② 梁启超：《变法通议》，《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中华书局，1989年，第3页。

③ 同上，第7页。

④ 同上，第8页。

⑤ 同上，第12页。

⑥ 同上，第53页。

和吸收西方近代科学入手，“日人之游欧洲者，讨论学业，讲求官制，归而行之”，这与中国人“游欧洲者，询某厂船炮之利，某厂价值之廉，购而用之”是根本不同的，“强弱之原，其在此乎！”<sup>①</sup> 所以，梁启超在总结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经验后，提出“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sup>②</sup> 并指出日本的由弱变强之道也在于此。“抑岂不闻东海之滨，区区三岛，外受劫盟，内逼藩镇，崎岖多难，濒于灭亡，而转圜之间，化弱为强，岂不由斯道矣乎！”<sup>③</sup>

## 2. 借途日本，学习西方

梁启超认为，近代日本的成功，是由于向西方学习的结果。“日本之步武泰西至速也，故自维新至今三十年，而治艺成。”<sup>④</sup> 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日本基本上消化了西方文化，因此，中国学习西方，只要借途日本，就可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因为，“泰西诸学之书，其精者日人已略译之矣，吾因其成功而用之”。他推崇其师康有为的学习模式：“以泰西为牛，日本为农夫，而吾坐而食之”，<sup>⑤</sup> 认为这种借途日本学习西方的模式，是最为经济便捷的途径。尽管“日本于最新最精之学，虽不无欠缺”，但是，“中国人而得此，则其智慧固可以骤增，而人才固

① 梁启超：《变法通议》，《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中华书局，1989年，第8~9页。

② 同上，第10页。

③ 同上，第11页。

④ 梁启超：《读日本书目志书后》，《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中华书局，1989年，第53页。

⑤ 同①，第54页。

可以骤出，如久餍糟糠之人，享以鸡豚，亦已足果腹矣，岂必太牢然后为礼哉？”<sup>①</sup>

如何借途日本？梁启超提出了两种主要的方法。

第一，译读日本书，移植西方新学。

梁启超认为：“今日中国欲为自强第一策，当以译书为第一义”。<sup>②</sup>他一再强调：只要“尽译其书，译其精者而刻之，布之海内外以数年之期，数万之金，而泰西数百年数万万人士新得之学举在是。”这样，就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用最少的人力和财力成功地移植西方新学，就可以使中国达到“言矿学而矿无不开，言农、工、商而业无不新，言化光电重天文地理而无不入微”<sup>③</sup>的地步。他希望中国各个阶层，都来读日本之书，这样中国就会免受瓜分之祸，由弱转强。

同时，梁启超在上海创办了大同译书局，把学习研究日本作为译书局的方向，表明了梁启超急于通过日本了解西方、学习西方，希望中国早日强盛的心情。

第二，学日本文，成效“速而多”。

梁启超认为，中日为“同文之国”，“汉文居十之七”，日本文比学西方文字有很多方便之处，所以中国要想学习西方，借途日本则更为便利。

居日本期间，他阅读了大量的日文书籍及日本人翻译的近代西方启蒙主义思想家的著作，对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

<sup>①</sup> 梁启超：《论学日本文之益》，《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中华书局，1989年，第81页。

<sup>②</sup> 梁启超：《读日本书目志书后》，《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中华书局，1989年，第52页。

<sup>③</sup> 同上，第54页。